

胡安泰

暨南往事

引领杂志社

暨南往事

胡安泰

引领杂志社

图书数据

暨南往事/胡安泰编写

湖北 引领杂志社 2007 年 6 月

I. 暨… II. 胡… III. 往事

暨南往事

出版发行:引领杂志社

地 址:湖北荆州北京中路

邮 编:434000

准印证号:[2005]鄂荆图内字第 26 号

印 刷:中国石化荆州石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字 数:183 千字 印张:7.3

开 本:850×1168(毫米)1/32

印 次:2007 年 6 月第一版 200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工 本:2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写在前面

大学是我的梦，暨南大学园了我的梦！

那是1964年7月，在我参加工作两年零八个月并有了一定积蓄后参加了当年的高考，有幸录取暨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五年后毕业，先后在广东和湖北工作，四年后调入金融部门。一直在银行工作至今。

2001年11月16日我应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暨南大学校长刘人怀先生邀请，参加了我国著名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建校95周年校庆，在第二届校友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暨南大学校友总会理事。作为这所学校的校友，能回母校参加如此有意义的盛会，给了我极大的荣耀，并让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这次庆典活动后5年将迎来暨南大学百年华诞。作为暨南人，用什么向百年母校献礼？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编写一本介绍暨南百年往事的小册子，以宣传暨南风采、弘扬母校精神。在我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从2003年5月开始以有关暨南资料为素材编写了《暨南往事》一书，于当年11月完成，共计24万字，并请母校著名书法家陈初生先生题写了书名，准备交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当时该社同意列入出版计划。由于离母校百年校庆还有三年，为了让书稿更完善，我先出了征求意见稿，内部印发。此稿我分别寄给了暨南校总会崔仁辉先生和校长办公室、暨南出版社。

2005年我收到暨南校友总会《暨南往事》征稿函，内称作为暨南百年华诞出版计划《暨南往事》一书向暨南校友征稿。在2006年11月暨南百年庆典期间我收到了由马兴中先生任主编的《暨

南往事》一书。该书以校友来稿及《暨南大学》校刊、《暨南校友》期刊等资料为主要内容编辑而成。

现在印发的这本《暨南往事》一书是在我 2003 年版基础上增加了近三年的“往事”及我亲历亲为的“往事”内容,删节了部分与校版“撞车”的章节而成,因此,具有它自身的特色!读起来应该有些收获!

以此作为我向暨南母校百年的献礼吧!

目 录

写在前面

黄炎培筹办暨南学校	(1)
鲁迅先生与暨南学生	(9)
奇人曹聚仁与《暨南的故事》	(17)
郑振铎与暨南“最后一课”	(26)
钱钟书与他的暨南学子	(34)
“新月派”名流在暨南	(41)
暨南演讲台上的奇特景观	(50)
“两院”院士在暨南	(60)
开“招搏”先河的暨南四名师	(70)
进入国际科学前沿的暨南人和他们的事业	(79)
百年暨南诞生记	(88)
同根共生话说“两暨南”	(92)
暨南 211 工程建设巡礼	(99)
“侨校加名校”战略实施在暨南	(108)
奋进·包容·创新——也谈“暨南精神”	(115)

我与我的三位经济学老师	(118)
暨南六先贤铜像倡立记	(128)
关于《郑振铎在暨南大学》电视剧本的通信	(136)
三帧暨南往事像片发现记	(145)
范以锦与他的《南方报业战略》	(151)
百年校庆在暨南	(158)
出自领袖家门的暨南人	(167)
集才气人气拙气于一身的著名诗人汪国真	(174)
万国墙“讲述”的暨南故事	(182)
暨南学子的尊师情怀	(193)
人间真情贯“白云”	(202)
暨南亲情缘	(213)
校友会及暨南校友的“丰碑”	(223)
后记	(233)

黄炎培筹办暨南学校

知道黄炎培先生的人，大凡知晓他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者，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职业教育家。对于他对我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贡献，特别是在恢复或筹办暨南学校过程中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功绩却鲜为人知。专为黄炎培立传的《黄炎培》一书作者亦极少提起。岂不是一件憾事。黄炎培先生在我国华侨高等教育史上是不可不提的人。

为暨南复校而奔波

素有“华侨最高学府”之称而声誉远播的暨南大学，其前身是清末两江总督端方（1861—1911）创办于南京鼓楼薛家巷妙相庵的暨南学堂，时间是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暨南学堂创办的宗旨，可用端方《筹设暨南学堂片》中的一句话：“宏教泽而系侨情”概括。至1909年4月，先后有南洋爪哇岛、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日惹等6批归国侨生共计175人就读。后任新加坡大学首任华人校长的著名侨领李光前博士就是这批侨生中的佼佼者。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当时在南京的清朝两江总督张人骏、提督张勋等仍效忠清王朝，遏阻策应革命的新军，对剪了辫子的暨南学生也很戒备，把大炮架在北极阁，正对着暨南学堂，师生受到极大威胁。为了安全，学堂星夜租车送学生到上海避难，大部分侨生乘船回南洋，小部分投入新军或去武昌投奔黄兴，师生星散。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国，海外侨胞为之欢欣鼓舞，爱国热情高涨，华侨心系祖国，热心办学，海外教

育有很大发展。暨南学堂在战乱中停教了,但华侨学生回国求学的愿望还没有消退。1916年冬巴达维亚中华会馆董事陈金山先生回国访问,会见了北洋政府教育次长袁希涛和江苏教育司司长黄炎培,会谈了添列华侨教育补助费于预算案。1917年夏,北洋政府教育部委派黄炎培、林鼎华赴南洋调查华侨教育状况。黄炎培等5月15日起程,先后访问了新加坡、马六甲、吉隆坡、三宝瓏、泗水等地,在泗水参加了“荷属学务总会”组织的教育研究会,广泛接触了南洋各地的华侨父老,对南洋华侨教育状况及华侨对祖国教育之期盼取得了十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8月23日返达上海,历时三个月零8天。黄炎培在归途中写了《南风篇》,拟就《南洋华侨教育之商榷书》,详细报道了此行的经过和收获,并就南洋华侨教育问题提出了10条建议。如在描绘在南洋广泛而紧凑地接触华侨各界人士时,《商榷书》中写道:“获与六十二埠、六十六校、七十八教员上下议论者四日夜”。《南风篇》及《商榷书》之初稿当时发表于《教育杂志》,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对南洋侨教的注意。回国后不久,即9月初,黄炎培向北洋政府教育部作了南洋之行的报告,陈述兴办华侨教育之重要,极力建议尽快恢复暨南学堂。

鉴于黄炎培对华侨教育的热心及知情,1917年11月1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黄炎培为筹办员,负责暨南复教复学之事。11月24日黄炎培即邀江苏教育会同仁赵正平到南京向省政府接管原暨南学堂的校舍、校具,正式设立筹办处,进行复校工作。他会同赵正平拟订了《暨南学校章程》,这是筹办处设立后拟报的第一份文稿,11月27日报教育部。《章程》将复办的暨南学堂改名为暨南学校,体现了黄炎培与时俱进的精神。暨南复校的喜讯很快传至南洋,华侨奔走相告,无不欢欣鼓舞,苏门答腊华侨子弟游进勉等7位华侨学生闻讯后即于1917年底抵达南京,要求入学。当时因复校工作尚未就绪,黄炎培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商定,在该

校增设补习科,安排提前来宁的侨生。

暨南学校筹办处 1918 年 1 月 8 日将黄炎培等拟写的《暨南学校章程》及《暨南学校规复宣言并招生启》等寄发南洋各地。《宣言》称:“今将原有之暨南学校从新恢复,扩充规模,改良办法,分设专科,并经营有利于华侨教育之各种事业,……决定于民国七年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三月开学,校址仍在南京鼓楼南薛家巷,有志求学者,请速起程。”《暨南学校章程》称:“本校以招集华侨子弟已在南洋受有初步教育者,授以适应于南洋需要之知识技能,并发达其爱国思想,俾毕业后从事于华侨教育或实业,冀其事业之改良与发达为宗旨。”“本校暂依中等程度办理,渐进乃施高等教育。在未施高等教育时,华侨有欲送其子弟入本国大学或专门学校,或为升学计欲入普通中等学校者,本校负指导介绍之义务,须补习者,并设法使之补习”。黄炎培等在所拟《宣言》和《章程》中将暨南学校的宗旨、任务和发展方向作了十分明确的阐述,这在我国华侨教育史上留下了重要意义的一笔,是宝贵的侨教历史文献。

暨南学校筹办期间,黄炎培不辞辛劳,筹措经费广罗教员,并率同所聘职员,收点前暨南学堂校舍、校具、书籍、仪器,进行修缮、添置、扩充,至 1918 年 2 月竣工,耗资万元,校园整治一新。1918 年 3 月 1 日,暨南学校补习科开课,停课 6 年的华侨学校,在黄炎培等的努力下,经过短短 5 个月的筹备,重新恢复了,正式改名为暨南学校。3 月 8 日,经黄炎培推荐,北洋政府教育部委任赵正平为国立暨南学校校长,令黄炎培继续筹办发展事宜并会同规划校务。1918 年 3 月至 9 月侨生由南洋各埠华侨教育界的校董、校长、教员及学生亲属护送来暨南学校就读的有 20 余批次,60 余人,少数在国内的侨生闻讯后由上海复旦公学(即上海复旦大学前身)、南洋公学(即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沪江大学和福建华侨公学等校转来就读。后爪哇三宝瓏商会建议学校兼收若干内地学生,使侨生与国内学生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学校经研究,变通章程,于1918年5月呈报北洋政府教育部,称:“凡国内高等小学毕业,其父兄和保护人现在南洋经营商业者,又师范科华侨学生有缺额,而国内学生有赴南洋为教师之志愿,且具有相当资格者,均得适用入学手续,准予入学试验。”是年8月,暨南学校在南京、北京、上海三地举行国内学生招生考试,应试学生超过400人。1918年9月9日暨南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师范科、商业科及补习科等正式上课,共有学生110人,其中华侨学生70人、内地学生40人。师范科学生49人,商业科学生25人、补习科学生25人,11人到附小学习。

暨南学校按照黄炎培教育构想,结合南洋华侨社会之需要,除设有中小学部外,创设了师范和商业两科,黄炎培在南洋考察教育时,特别注意到培养华侨师资及商业人才的迫切性,他在《暨南学校概况报告书》(第一次)中写道:“今南洋教员大都来自内地。为教员者苟不明所在地情形,或不谙所在地语言,则教材安能适切。学生家庭又安能联络,故培养适当之教员。自是南洋教育一大问题”。“侨民子弟稍长,大都为谋生计,中途退学,毕业者寥寥,遑论升学。游踪所及,几乎各地一致,此尤为需要职业教育之明证”,“吾侪因而确认南洋社会需要商业教育,实有非常迫切之情势,则非仅在小学略授以商业知识,如所谓预备商业教育者为克能满足其要求”。在他的倡导下学校在恢复时首先设置了师范、商业两科。校园内还设贩卖部和学生储蓄银行,供商科实习之用,同年还开设了南洋物品陈列室,征集国内外特产物品、历史文物等,所陈列物品由归国侨生带回,或由南洋华侨赠送。学校还办了《中国与南洋》杂志,以增强国内与南洋的联系。黄炎培对该杂志的名称作了如下说明:“《尔雅》不云乎:暨与也。中国与南洋,犹名吾校之名,而行吾校之志也。”民国初,学校办刊物还是一件少见之事,有人问:“办学校就该专门办学校,办刊物就该专门办刊物,为什么学校要办刊物?”,黄炎培在《中国与南洋发刊词》中回

答道:《暨南学校规复宣言》已说得很明白,学校将“经营有利于华侨教育之各种事业”,创办《中国与南洋》与“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该刊物出版了5卷25期,每期分送海外华侨和国内热心南洋事业的有关部门和人士,不仅沟通了国内外的联系,对推动南洋问题及华侨问题的研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暨南发展而操劳

暨南学校复办后,在黄炎培的努力下,学校参加了国内新教育的改革。1919年1月,暨南学校与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前身)、江苏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发起组织了“中华新教育改进社”,翻译出版新书、发行月刊、介绍西方在教育、科学及文化方面的情况和知识,对改进国内教育起到一定作用。黄炎培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在暨南复校之后的1919年春和1921年春两次下南洋,所到之处开会演讲、调查访问,介绍暨南办学情况和计划,征集南洋物品,劝导华侨子弟归国求学,其在南洋的活动受到侨胞的热烈欢迎,扩大了暨南在华侨中的影响。

为发展商科教育,培养高级商业人才,应南洋侨界人士的强烈要求,暨南学校于1920年1月草拟了创设商科大学宣言书及计划书,得到上海总商会、江苏省教育会以及国内著名实业家张謇等的支持。3月,黄炎培即与暨南学校校长赵正平等人开始筹划设立商科大学事宜,黄炎培被推荐为筹备处主任。其间,他多次主持筹备会议,呼请社会各界予以支持,并邀请陈独秀到会演讲。同年9月27日黄炎培与郭秉文、蒋梦麟在北京约请了蔡元培一起拜访了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向他陈述要求有关暨南学校迁沪、设商科大学以及南京高师升改东南大学等事项,范源濂允诺。1921年2月,暨南学校商科首先迁入上海徐家汇,以松社(纪念蔡萼的图书馆)为校舍。这一年的夏天东南大学设立后,经两校协商合办上海商科大学,以上海霞飞路尚贤堂为校址,推举黄炎培、赵正平、

郭秉文、黄奕柱、史量才、聂云台、陈光甫等 15 人为上海商大委员会委员，负责建校事宜。7 月 13 日，暨南学校校长与东南大学校长联名呈报北洋政府教育部备案。8 月 15 日举行首届入学考试，9 月 28 日开学，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暨南学校合设上海商科大学”，郭秉文兼任校长，聘马寅初为教务主任。上海商科大学是我国设立的第一所商科大学。一年后，即 1922 年 6 月，据暨南学校《扩充海外教育案》决定，退出上海商科大学，单独办商科大学部于上海徐家汇、定名为“国立暨南商科大学”，高阳任主任（校长），聘马寅初、潘序伦等为教授，9 月在上海真如新校址开学，这是国家办华侨高等教育的开始。

按《暨南学校章程》第二条规定：“本校置校董若干人，规划本校进行事宜”，“在校董未推定以前，就国内外卓著声望，热心南洋华侨教育者推定若干人为名誉赞助员。”暨南学校恢复之初，首任名誉赞助员是黄炎培与时任中央教育会会长的张謇。后推定江苏民政司司长沈恩孚及教育部特派调查南洋教务的林鼎华两人为名誉赞助员。暨南学校校董会校董在 1921 年推定，1922 年 3 月 2 日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发出聘书，后有所增聘，计有：范源濂（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林文庆（归侨医学家、教育家，后任厦门大学校长）、袁希涛（教育次长）、黄炎培、张謇、李登辉（归侨教育家，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简照南（华侨实业家）、黄奕柱（中南银行行长）、郑洪年（交通部次长、首任暨南学堂堂长）、史量才（《申报》主笔）、柯成懋（教育家，后任暨南学校校长）、以及赵正平、韩希琦、严家炽、陈炳谦、叶光崧、林熊徽、钱新之等 18 位知名人士。

1922 年 3 月 19 日暨南学校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一品香”召开，提出了 4 个议案，其中第二个议案“设置筹备新校舍委员会案”决议：“本校设置新校舍筹备委员会，由全体校董担任，并由校董中推举办事委员七人，筹拟集款方法、规划校舍工作与各校董接洽进行。”被推荐办事委员的除首推黄炎培外，另有袁希涛、

史量才、郑洪年、柯成懋、韩希琦、钱新之等6人。暨南学校兴建新校舍之事始于1922年夏秋之交,因南京旧校址已无修建新房余地,黄炎培等决定在上海附近乡间找寻,后上海宝山县士绅钱印霞建议择地真如乡。真如乡距上海不过10余里,乘沪宁火车一刻钟可到达,交通便利、环境幽静,地价较廉。校董经反复商议后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在真如车站旁南盈墟紧沿沪宁线勘定200余亩土地为校址,工程于1922年6月18日动工,1923年夏末第一期新校舍竣工,暨南男校师范、中学部、商科分别从南京、上海徐家汇迁入真如新校。

1922年12月9日,暨南学校第二次校董会通过了《扩充新校购地附办新村》案,即在学校之旁购地450亩建新村,合新校舍220亩,共征地670亩。该村定名为“暨南村”。为什么要建暨南村?据赵正平《暨南村建设记》记载,黄炎培在1924年4月10日举行的村友大会上代表校董会作了《筹设暨南学校村之旨趣》的报告,报告中回答了这个问题:(1)有利于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互相联络,使学生了解按照理想实现新生活新社会之精神。(2)使南洋华侨回国者有适宜之居住处,以鼓舞其回国振兴实业之念。(3)希望使热心新村事业者有一个试验的机会,外国人都说中国人程度不足,希望通过筹设暨南村集合一些热心人士作试验,一以冀表现中国人的程度究竟如何,二也看吾人之希望能否达到。

华侨女生回国求学始于1916年。暨南学校复办时,华侨女生回国人数逐渐增多,由于暨南学校复办时只招男生,华侨女生多数进了教会女校,但其所受教育大都不适应华侨社会生活及需要。1922年春,黄炎培与校董袁希涛、校长赵正平商议,决定筹办暨南学校女子部,并于秋季招生,为此,学校编辑出版了《中国与南洋》第7期“女子专号”特刊,登载《暨南学校开办女子部宣告》、《国立暨南学校女子部简章》、并发表了《本校女子部教育之旨趣》、《敬告南侨女学生》专文,开创了华侨女生回国就学专设女子部之先

河。

保持和不断加强同南洋华侨的联系,为南洋侨教推介人才,是暨南学校的办学方针之一。作为赞助员和校董的黄炎培,不仅把为南洋介绍人才列为学校的办学内容,而且身体力行,作出表率。仅在暨南学校恢复后的第一年,黄炎培以个人名义或以学校名义介绍到南洋担任中小学校长及教员者不下 30 人。如介绍暨南学校学监徐开舆和补习科主任许克诚分别到新加坡中学和槟榔屿中学任校长。学校对介绍的教员所需旅费,或由学校垫付,或由学校贷给,以示支持。对于来校访问的人员,特别是南洋侨教界人士均给予热情接待,许多回国的华桥大多亲临暨南参观、发表演说、慰问教师、鼓励子弟,其中著名侨界人士陈嘉庚、李登辉、梁炳农等先后到校参观。黄炎培及校长或各科主任均出面接待交谈介绍。为南洋侨胞服务,加强学校与南洋侨胞联系,为办好暨南学校,发展华侨教育事业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黄炎培先生致力于恢复暨南学校,热心华侨教育事业,为暨南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我国华侨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功绩将永载我国华桥教育发展史册。

鲁迅先生与暨南学生

提起鲁迅,无论是见过面还是没有见过面的,只要是读过他作品的青年学生,都会油然而产生一种崇敬之情。而与他谋过面,或聆听过他生动的讲演,或拜访过他当面接受教诲,或与其保持交往得到帮助的年青人,都会以此为荣而难忘终生。他们中就有暨南大学的学生们。说起来那还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在上海走完他人生最后十年中的事。

鲁迅与暨南的关系

鲁迅,188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原名周树人。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是毛泽东评价的“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文化战线上……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其一生的最后十年,即1927年至1936年在上海与暨南师生有过较频繁的往来。这在暨南校史上往往是被常常提起的。特别是他以极大的热情关心暨南学生,促进和帮助他们在动荡的年代明确方向,健康成长。

鲁迅与暨南的关系是从他与1927年暨南大学改组后延聘了一批与他有接触的暨南教师而开始的。据《鲁迅书信集》刊发的与鲁迅通信的对象看,许杰、郑振铎、曹聚仁、赵景琛、施蛰存、林语堂、张天翼、何家槐等先后到暨南任职任教或讲学。这一批教授学者中,与他通信最多的是郑振铎和曹聚仁,分别达58封和24封。特别是郑振铎,其通信数量仅次于与鲁迅通信最多的曹靖华、许寿棠和章廷谦,时间跨度从1933年2月至1936年10月2日,即至鲁迅逝世前的16天。可见交往之频之深。另据鲁迅1928—1936

年日记,在上海时期鲁迅至少与当时在暨南任教的八位学者有过往来,计除了郑振铎和曹聚仁外,还有夏丏尊、林语堂、汪静之、刘肖愚、章衣萍、章铁民等人。刘肖愚 1928 年起任暨南附中历史教师,常给《奔流》投稿,鲁迅日记中就有 23 处提及他。青年诗人汪静之,先后任暨南附中中国语文教师、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教师,鲁迅日记中也有三处提到。而关系最为密切的仍然是著名教授郑振铎与曹聚仁。

1935 年郑振铎在燕京大学受到排挤,意欲离开北平,鲁迅致信劝说郑振铎到许寿棠主持的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去工作。并致信许寿棠,说“此君热心好学,世所闻知,倘其投闲,至为可惜。”对郑振铎作了是“世所闻知”的著名学者的评价。对于后来郑振铎欲到暨南大学任教,鲁迅是有疑虑的。1935 年 7 月 16 日鲁迅致曹靖华的信可以看出,鲁迅写道:“暨大情形复杂,新校长究竟是否到校,尚未可知,倘到校,那么,西谛是也去的。我曾劝他勿往,他不取用此言。”可以看出鲁迅对郑振铎的关心和了解。说到曹聚仁,1927 年鲁迅与曹聚仁夫妇在内山书店不期而遇,这是他们首次见面,当鲁迅转过脸来对着他们夫妇时,曹聚仁很快走过去,伸出手自我介绍说:“我是曹聚仁,暨南大学的。”鲁迅站了起来,伸出手与曹聚仁热烈的握着手。多么有戏剧性的见面呵!从此开始了他们间十年的交往。

1927 年暨南大学改组,首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夏丏尊教授与鲁迅有较深的友谊,他们先后留学日本,早年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相识,朝夕相处好几年。当 1927 年 10 月鲁迅离开广州中山大学抵达上海,10 月 5 日夏丏尊就前往鲁迅下榻的孟渊旅社探访,因鲁迅外出而未能见面。鲁迅得知后于 12 日回访夏丏尊,相聚甚欢。夏丏尊表达了学校邀请鲁迅讲演之意。当时暨南大学改组不久,中文系只有一年级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南洋归国的侨生。因久闻鲁迅先生的大名,当得知鲁迅与许广平一行抵达上海,便以上海暨